

中国云南两个少数民族村落影像民俗志

——民俗文化在传播中的意义蜕变

THE TRANSFORMATION OF THE MEANING OF FOLK CULTURE

IN THE PROCESS OF COMMUNICATION:

A CASE STUDY OF FOLK CUSTOMS IN TWO ETHNIC VILLAGES

IN YUNNAN, CHINA

熊术新

XIONG SHuxin

博士

PhD

悉尼科技大学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SYDNEY

2005

Students are required to make a declaration when they submit the thesis for examination. Here is a recommended form of words.

COPYRIGHT STATEMENT

I guarantee that the images used in this dissertation are mine, that the help I received and the documents I quoted have been annotated in the dissertation, and that this dissertation has not been used to apply for any other degree.

I agree that the university can keep my dissertation in the archives for other people to consult, and that the photographs won't be used in any non-academic field.

Signature of Candidate

Production Note:
Signature removed prior to publication.

鸣谢

我的少年时光大都在农村度过。最感兴趣的是村子里的节日。火把节，稻花飘香了，上山跟着大人采一袋松香用松毛拌好，装在一个袋子里系在腰上。手拾一支火把，从村头跑到村尾，见人就抓一把松香洒在火上。一声轰响，火苗大窜，向人喷去，相互追逐，高兴万分。我生病了，外婆把我带到青龙水库的大树旁叫魂。外婆用碗抬着一个鸡蛋，把我失去的魂唤回到鸡蛋里，然后回到家让我把鸡蛋吃掉。鸡蛋是看得见的，但魂不知藏在鸡蛋的什么地方，有一种敬畏感，看不见的地方是一个鬼魂的世界，外婆认为那些地方无论大人、小孩都不能随便打听。村子里结婚，年轻人要给来做客的人抹大花脸，谁如果不从，几个年青人就会冲上去将此人按倒，非抹个大花脸不行。特别是漂亮的村姑亲戚，小伙子们总是要穷追不舍。年青媳妇负责捶饭，象巡逻的士兵在酒席旁游动，一不注意一大碗饭就扣在你的碗里。谁捶饭厉害，就被认为是能干的媳妇。捶在碗里的饭是不能倒掉的，必须吃下去。有时是几个媳妇联合行动，收拾来客，越是尊贵的客人越是捶饭的对象。

三十多年前的记忆，总是挥之不去。那些村民的意义记忆都是在这些日常生活的民俗中完成的。在民俗约定的时空中，每个参与者都在村落中找到了位置，形成了“我们村子”的文化识别，在心灵的深处，实现了文化的联接和认同。而现在，这一切都消失了。

现代社会的出现，是不是一定要以摧毁“民间意义”为代价？村民们几千年所共享的“意义世界”一定只允许有一种方式？那个即将消失的世界真的是与“现代化”不是你死就是我活吗？正是这样的良知的召唤，使我走进中国云南两个少数民族的村寨，尽力用影像的方式，纪录这两个村寨村民的民俗生活。总想社会的变迁不要再去无情地占有他们的心灵世界。

三年多的时间，我们先后十多次到泥戈村与大沐浴村进行田野调查。民俗的呈现与演变进入了我们的学术视野。我们极力地去辨析它，但民俗事象在村落中的展开有着无限的丰富性。虽然我们做了十多万字的文字纪录与问卷调查，拍摄了3千多张照片，摄录了600分钟的

影像资料，但那个民俗的世界还有许多“文化存在”我们尚不清楚。

我认为，文化是可视的，文化不是一个摸不着、看不见的抽象物。新的文化研究的目标就在于探究怎么去发现和展现这些常人以为是游移不定、无可捉摸的文化内涵。文化的语法不仅仅是以语言、认知写成的，也是以神话、宗教、艺术、民俗乃至丧葬典礼仪式等文化本文和文化话语写成的。我把这一点看成是“影像民俗志”的内在生命。

三年多时间，读了很多书，其核心的概念是：文化——传播——民俗——影像志——现代性——地方知识。与许多大师对话，经常使自己进入失语的状态。最后我选择了“文化在场”——“我在故我思”。虽然不够宏大深厚，但我力求于“我思”。导师冯崇义先生经常教导的是：做学术你要有思想。我理解为在学术的叙述中，你必须有你的生命体认的表达，或学理的、或情感的、或抽象的、或具体的，但应是“你的。”冯先生给了我一个宽阔的文化语境：只要有自己的发现，就是学术。在悉尼科技大学的日子里，我看到并生活在一个多样的世界。现特应感谢。

这个课题的完成，要感谢我的同事们。他们是：苗明、孙燕、章新、李崇科、杨文学、白碧波、王颺。民俗的影像志不是我一个人能完成的。悉尼科技大学的杨径青博士，在与我几次讨论中，对论文结构提出了非常有益的建议，也表感谢。三年中妻儿与我一齐跋涉，其中甘苦，难以言表。

羊街乡的乡长郑荣、乡文化站长倪伟顺也成了我的好朋友、哈尼兄弟，他们是哈尼文化的拥有者，他们最有阐释文化的权力。但这样的权力没有交在他们手中，而是交在远离“文化存在”的知识分子手中，包括我自己。

多少次在村寨中喝酒，那些生命的真实，使我脱掉了文化的虚伪。为他们的生活意义的表达，我会一生地去寻找。



■ 论文作者熊术新在泥戈村、大沐浴村作田野调查

目 錄

内 容 摘 要 6

民俗文化内容十分繁复，我重点阐释的是在这两个少数民族村落里群体性的习俗活动，包括节庆、婚丧仪式、服饰表演。在这些群体性的民俗事件中，还顽强地呈现着、传承着村民们的历史文化记忆，共享着自身文化的呼吸，并确认自身的存在。

绪 论 8

“田野的叙述”是民俗志的基本叙述方式，村落成为考察“文化意义”的单位，影像的叙述、文献的叙述与“在场”调查实录构成三位一体的文本形态。文化批评是一个理性的视点。

一、两个村落——日常与想象的生活世界 25

少数民族村寨在当代已经政治化与社会化了。民俗事象在村寨里顽强地呈现着并寻找自己更大的生存发展空间，在此过程中“它者”极力地建构一个俗民生活的想象的世界。

二、节庆——文化获得意义的过程 73

少数民族村落和俗民群体对于民俗事象的感知，对于文化符号的理解是在节庆的展开过程中完成的，民俗的完成者分裂成“表演者”与“观看者”，民俗的仪式感，神秘性丧失了。

三、婚礼——族群文化的认同与意义共享 104

婚礼、丧礼作为人生礼仪的重要民俗活动部分，积淀了一个民族深层的文化心理。原始信仰、祖宗崇拜、民间俗信、风情习俗都可能在婚礼与丧礼——民俗事象的过程中呈现。

四、哈尼舞者——“文化领袖”倪伟顺 204

在民间文化的重建中，民间文化的持有者“文化领袖”，承担着重要的角色。他作为一个文化符号的继承者、表述者、创造者，重新建构哈尼族的历史记忆，在已经被国家组织形态所占领的社会中，寻找文化存在的有限空间。

五、花腰傣服飾——符号的民俗 …… 229

少数民族服饰作为一种符号与象征，是一种规则和符号的系统，是处于纯粹状态中的无声语言和标志。在现代流行时装中也能找到它们的影子和踪迹。

结 论 …… 249

影像民俗志的调查方法不仅仅是一种搜集资料的途径，它也是一种观察和理解这个世界的视野，因此，它同样也是一种理论。



■ 作者在新平县大沐浴村古渡口进行田野调查

中国云南两个少数民族村落影像民俗志

——民俗文化在传播中的意义蜕变

内容摘要：

本文采用中国文化人类学形成的研究传统社区（村落）的模式，对中国云南两个少数民族村落——哈尼族的泥戈村，傣族的大沐浴村进行了田野调查，前后大约有三年多的时间，作了十多万字的文字记录与问卷调查，拍摄了3千多张照片，摄录了600分钟的影像资料。民俗志所要求的参与观察、直接体验、深度访谈、问卷调查等基本方法在田野调查中都安排使用。

在田野调查的同时，查阅和引用了大量的地方文献资料，包括所调查乡镇的政府工作报告，宣传画册等。一些学者对民族文化的描述也引到这部民俗志的整体结构中来比较，印证，特别把现代传媒所表述的内容与田野叙述联系起来，使传统民俗志从封闭的空间解放出来，在“共时性”上与当代社会生活产生联系。民俗文化成为两个特定区域（村落）生活着的文化。文化的变迁就是村民的（俗民的）生活方式与意义的变迁。

民俗文化内容十分繁复，我重点阐释的是在这两个少数民族村落里群体性的习俗活动，包括节庆、婚丧仪式、服饰表演。在这些群体性的民俗事件中，还顽强地呈现着、传承着村民们的历史文化记忆，共享着自身文化的呼吸，并确认自身的存在。

本文把“民俗整体研究”的理论阐述，用独特的田野个案来实践之。体现在该论文的逻辑结构中形成了较为完整的叙述秩序：

以具体的民俗事件为中心，构筑民俗主体活动过程的真实情景，以田野调查及影像叙述的方式，直观对象本身，形成共时性的民俗文化的呈现与阐释，以研究对象的充分信息建构整体的认知单位，形成以人的活动为对象的民俗整体研究，并观察与理解在具体的村落民间文化的变迁与在国家权力的组织下的民俗文化的意义蜕变。

在本文中形成了这样一个叙述结构与内涵表述：

①村落田野调查——影像的、文字的 / “在者”观察的生活事件

② 地方文献——文字的、图片的 / “它者”描述的生活事象

③ 现代传播——地方影像、文字报道 / 国家在场的象征形态

本文的学术贡献在于“影像民俗志”文本的创立。影像在文本中具有叙述的意义，使“民俗整体研究”的理论构想有了具体的操作方式。“民俗整体研究”所追求的“民俗发生的情景”，“民俗活动着的主体”，“正在发生的生活”在影像叙述中得到完整的表述。田野工作和民俗学资料的视觉表达把我们引入了非语言性社会行为研究的领域。非语言性社会行为研究是一个崭新课题，不同于借助文字作为载体描写和记录的文化志，非语言性描写的视觉资料有其即时性、保真性、全面性和临场感。

影像的叙述、文字的叙述与文献的叙述三位一体，创造一种“影像民俗志”的新文本。在不同传播形式下构成的不同的民俗意象，共同形成了一个多重的文化意境，对于民俗意义的理解，是在对三种叙述复合同构的理解中。民俗志其实是一个“建构框架”。这是影像民俗志新文本构成的阐释方式。民俗事象在传承过程中的立体的文化空间，在三种叙述方式的交叉中，构成实体意义。意义指向是在建构中实现。

村落民俗文化受到各种力量的侵蚀，本文考察和分析了国家权力，国家意识形态和市场与中国少数民族文化的互动。吸入了文化传播、仪式分析理论、文化批判的一些学术思想，形成了一种“民俗志”的批判视野，使传统的“民俗志”获得了当代性。